

中 央 研 究 院  
三 民 主 義 研 究 所

# 專 題 選 刊

(七)

## 治 統 與 道 統

從中國文化來看 國父與故總統  
孫、 蔣二公及當前之學術界

錢 穆

中 華 民 國

臺 灣 臺 北 南 港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五 月

# 治 統 與 道 統\*

從中國文化來看 國父與故總統  
孫、 蔣二公及當前之學術界

錢 穆

中國民族，在其四千年長期歷史中，乃爲一擁有廣土衆民的統一國家，此在舉世其他民族中，可謂絕無而僅有。秦漢以後，乃郡縣的統一。而秦漢以前，則爲封建的統一。唐虞夏商，史迹荒遠，其所以爲封建統一之政治，已難詳論。而西周一代體制，則史文詳備，明白可稽。雖秦漢以下，封建改而爲郡縣，然其所以爲統一政治之體制與精神，則依然持續，並無大變。

今論中國傳統政治之特性，可一言蔽之，曰是道義的，非權利的。亦可謂是文德的，非武功的。西周王朝，創自武王，其父乃商朝一諸侯，封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但周人追謚之曰文王，尊爲新王朝之創始祖。此即中國政治重道義不重權力，尚文德不尚武功之明證。故在中國歷史上，自唐堯虞舜，下逮夏禹商湯以至周代之文王、武王，莫不有種種道義與文德之傳述。故中國歷史上之治統，其實即是一道統。

此一治統即道統之觀念，明白暢宣之者爲周公。詩書具在，不煩詳述。但周公

---

\*本文原爲本(六六)年四月五日在中央研究院紀念 總統 蔣公逝世兩週年會中所作之專題演講。

終其身爲臣不爲君，其君成王尊事之，此下西周東周歷朝帝王莫不奉祠周公不輟，故使王室代表治統，而周公乃代表道統，抑且道統尤崇高在治統之上。無形中乃是爲臣者可以凌駕於爲君者之上，後世稱此曰禮治。禮樂作自周公，而禮之所在，則卽道之所在也。

後世最尊周公者爲孔子。孔子乃一魯國之平民，然魯廷擢用之爲大司寇，其位僅在三家貴卿之次。孔子以道不行辭魯卿位，漫遊列國，所至如衛如陳，雖不當政，亦莫不厚祿尊養之。返魯之後，其受祿養尊事弗衰。及其卒，魯哀公特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是當時人內心中，已目孔子爲道統所寄，治統固不能離道統以自存也。

戰國尊賢，其意亦卽尊道統，在齊有稷下先生七十二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七十二之數，卽效孔子七十二弟子而來。在中國傳統政體中，常有不負實際行政職務的學術性官員，此亦一特色。遠自西周起，已有大批史官，自王室派出，遍布列國，而不受列國政府之管轄，此亦政府中之學官。故孔子作春秋，曰：此天子之事也。天子之事在治統者，在下者固不得而干之。天子之事之在道統者，則固非天子之所專也。故孔子以一諸侯國中不負實際行政責任之學術性官員而得爲天子之事，其義卽在此。

言治統，有禮治，有法治。禮治重道義，尙文德，而法乃其不得已。孔子之後有孟子、荀子，專就其言治分之，孟子較重禮，而荀子則有重法之嫌，故其後有韓非、李斯。秦一天下，設立博士官，卽承齊之稷下先生來。博士官亦不負實際行政責任，而可以議政。此亦專掌學術之官，非政府法令之所制。而秦始皇帝從李斯言，罷博士官之不符朝廷意旨者，又焚其所掌之書，並定制以吏爲師。是欲以天子之權位，使治統凌駕於道統之上也。故後世譏之爲專制，而秦亦不永其祚。

漢武帝罷百家博士，專立五經博士，於是道統始定於一。漢博士稱孔子爲漢制法，蓋謂西周之治一本於周公，而漢之爲治，則當一本之孔子。故漢王室乃代表治統，而五經博士官則代表道統，道統猶當在治統之上。故雋不疑可以不辨真僞而依

孔子春秋定衛太子之罪。其後乃據孔子春秋通三統之義而競言禪讓，王莽終以代漢統。

春秋時人已言，天生民而作之君、作之師，君代表治統，師代表道統。君位治統可以有歷代之更易，而師傳道統則不隨以俱變。抑且爲君者亦必有師，故光武中興，而新代五經博士之職位如故。明帝見東郡太守張酺，先行師弟子禮，再行君臣禮，此皆師尊於君道統高於治統之歷史明據。今姑謂治統在政府，道統在學校，則自武帝以下，政府中人已盡屬學校中人，故余嘗名中國自漢以下之傳統政府曰士人政府，亦可曰學人政府。以近代語說之，則中國自漢以下之傳統政府，乃由學術界組成，受學術界之支持與領導。孔子弟子子夏言，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學術界之目標自當轉入政治界，以實現其所學。而政治界之條件則絕不能脫離學術界，而自行其所是。此種政治，可曰文治，亦可曰士治，亦可曰學治。此亦中國歷史一特有傳統，爲舉世民族之所無。

魏晉南北朝政治中衰，但當時門第，皆出土族，仍自學術傳統來。其時則學校教育轉移爲家庭教育，而政治盡操於門第中人之手，則仍是變相的道統高於治統也。故在當時政治上之統緒蕩搖多變，而門第傳統則安定不動。惟治統與道統分，則爲衰世，唐代復盛，仍是縮合治統道統而使之復合。唐太宗有十八學士，乃在政治人物中特別標榜出學術人物而加以尊敬，在君臣關係中明白增進了師與友的關係。故貞觀之治，其特別受後人稱道者，更重在魏徵一人。魏徵之官位並不高，然魏徵之對唐太宗，不斷直言極諫，儼如嚴師諍友，而唐太宗亦始終容忍，禮遇之不衰，此亦中國政治傳統特色之一種表現也。

下逮宋興、宋太祖有不殺士大夫之家訓，其子孫世守不敢背。此亦治統應尊道統之一徵。唐以前言道統，必曰周公孔子，宋以下言道統，乃曰孔子孟子。周公尙是西周王室一尊親，孔子孟子則皆屬平民身分。又唐以前學校教育及政府考試，皆重周公所傳之五經。而宋以下則重孔孟所傳之四書，此皆見道統地位隨於歷史演進而益尊於治統之上。即元代以蒙古人入主，仍在大體上遵守此大傳統而不變。清代

以滿州人入主，其遵守此大傳統，則較元代益遠過。

孔子在唐代謚爲文宣王，宋代加謚至聖文宣王，元代更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明代改稱至聖先師，清代定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又改稱至聖先師。漢儒僅稱孔子爲漢制法，而唐人必謚之曰王，宋人必添進一聖字，元人又添進大成字，明清兩代，則於聖字外又增入師字，而終減去其王號，僅存聖字師字則不可減，此歷代之遞變，正見師道之益尊於王道，道統之更高於治統，此自非歷代帝王之意，實乃歷代儒臣之意耳。

惟清代文字獄屢起，尤如雍正朝之呂留良案頒布大義覺迷錄於全國之學宮，是顯欲兼道統於治統，其爲異族政權之專制，上較秦代焚書，嚴酷尤甚。惟大義覺迷錄不久即自禁止，不再流布，而乾嘉經學，終不免埋首故紙堆中，自號漢學，反宋學，但漢學宋學同是以道統爭求凌駕治統之上，皆不失中國學術傳統之大趨嚮，而乾嘉經學則僅屬一種逃避，不問治統，專言道統，終是一僞道統。道咸以下，今文經學躍起，始是學術界重求凌駕政治界，有符於中國歷史之大傳統，而清代之治統，亦不久而熄滅。故中國人論歷代之盛衰興亡，亦多注重在其臣下與道統上，而多不重在其君主與治統上。

以上所述，乃中國文化一大特色，即學術必求能領導政治，而政治必求能追隨學術，有關人事方面之責任，學術界應更高更重於政治界。故做一大官，絕不能如當一大師之受人尊敬。做一大官，乃隨時事，當一大師，乃千古事，此所以中山先生亦教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中國人在此政學不分重學輕政之大原則下，乃使中國歷史能常保此一大一統之局面於不壞。而晚清之際，西學東漸，西方人言民治，言法治，無道統。其稍近於中國人觀念中之道統者，乃爲宗教，但必求政教分，不言政教合。其學校教育，則先從宗教衍分，政府既不重視學術，而學術亦必求自由，可謂與政治無甚深緊密之聯繫。此與中國歷史傳統有大分別。

中山先生之革命，淺識者謂其淵源自西方，而中山先生必自居爲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大傳統。是在中山先生之心意中，不欲專自居爲一政治人物。

在其開創民國，並不認爲僅是一治統更新，而更求有道統之復興。是中山先生仍是根深蒂固有其中國觀念之存在也。論中山先生之政治事業，僅如周文王。故總統蔣公，完成北伐，繼之以對日抗戰，乃如周武王。但蔣公信仰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雖其畢生，盡瘁於政治事業，而亦未嘗忽視學術。逮其晚年，避居來臺，猶自盡心於大學中庸之研究，又以復興中國文化爲號召。此見蔣公於治統外亦更知重道統，一如中山先生，不僅求爲一政治人物而止。實則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亦未有自外於學術界而能成爲一政治上之理想人物者。

在中山先生同時，如康有爲、章炳麟、梁啓超諸人，亦同有治統道統合一之傳統觀念存其胸中。但西學東漸影響日大，學風驟變，羣趨於爲窄範圍之專門研究，國家民族政治社會當前現實問題，認爲非學人事，可以置而不問，而於道統一語，則更所鄙棄，認爲是封建社會專制政體所遺下之陳腐語，甚至如宋元明三代歷時六七百年之理學運動，專據其不注意女子纏足，卽可以「不人道」三字一筆抹煞，更認爲禮教喫人，提出打倒孔家店之口號，而實則歷史長時期所傳之道統觀念，乃依然仍留存在當時學人之腦際，特認爲真道統應在西洋，不在中國。惟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乃足當之。

而又輕視政治人物，此亦仍是中國歷史遺傳尊道統於治統之舊觀念之一種變相呈露。於是如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乃鄙視之爲黨義，爲現實統治者之宣傳工具，一若可擯之於學術討論之外，無形中使學術與政治顯分成兩橛。學術界可以自外於政治，而政治學則僅爲大學法學院中一學系、一科目，亦成爲一窄範圍之專門研究，此與中國歷史傳統上培養政治人物之旨趣，大不相侔。此將使此下中國，既不復有道統，亦不復有治統，而「德先生」與「賽先生」，是否可代已往道統治統之潛存精神，則實應爲當前學術界一萬分值得首先探究討論之問題。

乃今日國人所共同希冀而盡力以赴者，則曰現代化。然現代化亦與西化不同，當前之政治可變，社會可變，而已往之歷史傳統則不可變。卽就西方英美言，同尊「德先生」，同尊「賽先生」，然兩國歷史不同，社會不同，斯其政治亦不能同，

更無論於義、法、德諸邦；而西方復有蘇維埃崛起，正亦因其歷史與社會之不同，而政治亦不能與英、美乃至義、法、德諸邦走上一途。中國人之道統觀念，正亦與其歷史傳統有不可分解之因緣，故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下及孔子、孟子，所謂道統，即是一歷史傳統耳。以今日語說之，亦可謂即是一文化傳統。今既謂歷史傳統可以不顧，而惟西方道統爲當尊，則何以必尊英美，而獨不當尊蘇維埃。故民國以來之共產主義運動，實從新文化運動中分出，如陳獨秀即其著例，華盛頓尙十足富有國別性，馬克斯則超出了國別性而若爲具有世界性。當年共產主義在中國崛起，此亦一主要因素。既需向外覓取一新道統，則追隨於某一特定國家之後而奉爲我之新道統，當斷不如追隨於超國別性之上而具有世界性之新道統之更爲合適。而且在當時人觀念，國民政府是純政治的，新文化運動是純學術性，只有共產黨乃是學術來領導政治的，豈不更合於中國人傳統的胃口。故即在當時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之風起雲湧，亦尙有所本有的歷史傳統的觀念從中作祟，惟惜吾人之不自覺察耳。

今論故總統 蔣公復興文化之號召，縱然不同於復古，然亦決非專意於抄襲。此事必從自本自根之歷史傳統中找命脈、覓生機，亦斷不限於政治，而有待於學術界之努力。但當前之學術界，歷史亦陷入狹範圍之專門研究中，僅爲大學文學院中一科系。在此政治學術分道揚鑣之形勢下，在學術界各自分道揚鑣之形勢下，誰負此復興文化之重任。則此一號召，亦僅將是一號召而止。今日之學術界，已不能復有如康、章、梁諸人，縱其學術意見不盡同於 孫、 蔣二公，然亦關懷於國家民族之大全體，同有歷史傳統之根脈；而今日之學術界，則全已走進西化過程中，回視前賢，實有隔世之感。則所希望於將來者，實惟有所謂現代化之新學術，與現代化之新政治，宜乎與歷史傳統無關。而亦將與 孫、 蔣二公之所想望者無關。此則仍待吾學術界自爲選擇也。

今日余應國立中央研究院之邀來作此講演。中央研究院屬於國立，但專從事學術上之自由研究，實亦寓有歷史傳統，政府專置學官，道統不隸屬於治統之遺意。

第一任院長蔡元培有言，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竊謂此兩語亦有傳統意義。惟其能讀書不忘救國，乃有歷史上道統之出現。惟其能救國不忘讀書，乃有歷史上治統之持續。此二語，實與子夏所言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義趣相同。中國歷史上之傳統政府，必知尊崇學術。政府中官員，上自帝王，下至宰輔，以及全國中外僚吏，多以不忘讀書為其職責外之職責。而歷史傳統中之讀書人，亦多以出仕從政為職志。孔子曰不仕無義。其或不仕，亦志在衛道，故孔子曰士志於道。蓋志道其主，而求仕其次。中山先生言知難行易，亦猶言知道難而從仕易也。在中國歷史傳統中，亦有決不出仕而自求其道如道釋，但亦為掌治統者所容忍與禮事。要之治統則決不輕道統，而自願屈居其下。今日而求中國之現代化，宜亦於中國自本自根之歷史傳統中求之。蔣公之號召文化復興，正有此意。我更將借用晚清魏默深的一句話，政治人才，有教化的與氣運的兩種，中國政治人才，乃是由教化孕育的，而西方的政治人才則似由氣運產生的。氣運盡則人才息，惟教化則可孕育無窮。此是一大問題，仍待吾們的學術界，作詳細的討論。今日距蔣公逝世兩週年紀念無多日，故特拈此題，以請教於吾國人學者，知我罪我，所不敢辭。



